

走向战争升级

1. 进攻长城及其战略指导

日军战略意图

长江口、上海滩的战火熄灭不久，塞上烽烟又起，日军对古老的长城发动进攻，其用兵之多、作战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

日军进攻长城南北地区，从作战目标看也是控制燕山之战。燕山山脉东濒渤海，西接阴山，大体呈东西走向，长约 500 公里，宽 150~300 公里，按当时行政区划分属河北、热河、察哈尔等省。它衔接华北平原、东北平原及内蒙古高原，长城在其间蜿蜒穿过，数千年来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演出过一幕幕“枌金伐鼓下榆关”的悲壮历史剧。它在地理上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在军事上更富于战略意义，日军对其格外重视。板垣征四郎 1931 年 3 月写出《从军事上看满蒙》，便指出它既是满蒙地区的屏障，又是跃击中原的跳板。

按日军战史揭示，日军在该方向战略意图有二：其一是攻占热河，扩张伪满洲国版图。日本规划的伪满政权所辖 6 省中包括

有“热河省”和“蒙古自治领”。日军强调：“经略热河，其主要目的在于使其名实具备归入满洲国领域，尽力消灭作为满洲国骚乱之策动力量的张学良势力，巩固满洲建国之基础。”^① 其二是攻占长城，控制整个燕山山地，便于向南用兵。比较自辽西方向进攻来看，利用长城进攻北平等要地更为近捷，故日军企图“确保对于长城重要关门的控制，调整对华北方面的战备，同时，扫荡省内残敌并恢复治安”。^② 上述两方面重心又在于后者。重光葵在回忆录中说：日本认为“只靠满洲的资源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因此绝对需要开发华北资源”。^③ 所以，日军用兵长城，乃是其攻占东北之后转换战争方向的必然步骤，是遵循其大陆政策逐渐南进的战略转折。

从东北进入华北，最为便捷的通路是辽西走廊。而辽西走廊挟于燕山山地与渤海之间，长数百公里，宽度仅数十公里不等，如果失去了对西边山地的控制，这条狭长的通道随时会有遭受截断的危险。当时，攻占锦州后，日军沿奉山线南下，已控制了辽西通道，直逼山海关，夺下山海关即可直接进入冀东平原。但中国军队控制着热河与长城山地，使日军顾虑到“仅控制奉山线是很不充分的”。^④ 后来的战争实践也证明，燕山山地，特别是承德及古北口等西部要地，对于补充冀东交通，支持对华北的战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1937年8月中旬，日军攻占平津之后，适值天降大雨，中国军队掘开白河河堤，洪水淹没平津机场，东部交通受阻。日军在平绥路及京汉路等地的作战，主要经由承德和古北口等西部据点进行后勤补给及空中支援。所以，古北口等长城通道，具有辽西走廊等东部通道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36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36页。

③ 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

④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44页。

再看冀东方向的实际状况。中国政府防范较严，建立了临永警备司令部。如果国民政府继续作山海关式的顽强抵抗，战斗将是激烈的。同时，英美列强在冀东与河北地区拥有巨大殖民权益，控制有唐山煤矿等势力据点。在该地区发生激烈战斗，很容易引起国际关注。因此，日军在攻占山海关之后，即转向热河及长城中段，企图在千古战场的丛山中，突穿通向北平等华北要地的通道。总体比较而论，日军在该方向行动比较自辽西、冀东进入华北，看似迂缓，实更近捷，具有“以迂为直”的意味。

当然，发动艰苦的山地作战，日军的坦克、装甲车等机械化武器将受到极大限制，补给亦将因远离铁道而增加许多困难。日军敢于如此犯险，其本身即已包含着日军将决然南侵的战略意图。该地区的巨大战略意义自然具有无比的吸引力。

日军在该地区一边作战，一边狠抓交通线整修，异常迅速决定修建战略铁路锦（州）古（北口）线。日本在历届中国政府多年的筹议基础上，于1933年2月进行实地勘测，4月着手施工，只用了8个月时间便于该年底完工157公里直达凌源的铁路。其后由于经费等原因一度停顿，到1938年4月，便完全修通从凌源到古北口以及从古北口到北京的线路。这条铁路自锦州附近的金岭寺到北京附近的通州接轨，合计669.6公里，为平行于京奉铁路的又一条战略干线，对其后全面进攻华北各地发挥了重要作用。锦（州）古（北口）铁路及通（州）古（北口）铁路的修建，正是日军长城作战战略意图的最后完成。

攻占山海关和热河地区

日军对山海关的进攻是扩张华北的第一战，也是其长城作战的前哨战。山海关被誉为“天下第一关”，又称榆关。根据1900年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日本在此地驻有守备队，隶属其驻屯军司令部，战前兵力已增为300余人，配置于南门外车站，故榆关南门和东门实质处于日军监视与控制之下。日军攻占锦州之后，

由第八师团沿奉山线南下，先后攻占兴城、绥中等地，配有飞机、坦克，前锋直逼山海关城下，控制了城东北方向高地。守军将领何柱国说：山海关一直处于“不战不守、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要塞，由于周边险要被日军控制，处于被包围的危险境地。

中国守军于1932年7月组建临永警备区，辖步兵独立第九、第十二旅、骑兵第三旅、山炮兵1个营和工兵第七营等部共约2万余人，司令官何柱国根据山海关实际态势，认为已经不具备坚守的意义，遂将山海关作为警戒阵地，只配备少量部队，而将主力向后配备于从长城界岭口东侧山地向南至北戴河海滨一线，作为主防线。

日军驻山海关守备队队长落合甚太郎少佐曾多次威胁和诱骗何柱国投日，被拒绝。1933年1月1日落合指令部下在营房扔手榴弹，炮制爆炸事件，并以此为借口于当日日军攻占了山海关。战前晚向南关和车站等处发动进攻，被驻山海关日军守备队曾登上击退。翌日，日军自绥中调来第八师团步兵3000余人及飞机8架、坦克20余辆、铁甲车3列、重炮40余门，^①另有军舰在海面呼应。中国守军第六二六团团团长石世安以下约2000人，沉着应战，击退了在飞机火炮配合下全面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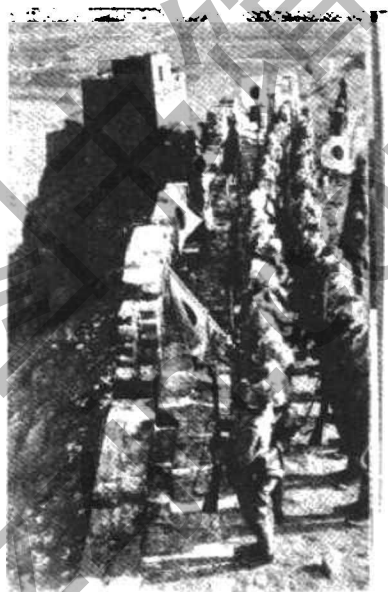


图12 1933年1月3日，

^① 何柱国：《山海关防御战》，见《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409页。

攻的优势日军。3日上午，日军的大规模进攻仍未得手。中午，日军调整部署集中火力攻击南门，守军第一营自安德馨营长以下几乎全部战死，日军坦克闯入南门，东门和北门亦相继被占，下午3时石世安团长下令余部撤出。是役，守军伤亡大半，而日军被毙伤约400余人。日军其后对临永警备区主防线上的石门寨及九门口等地进行试探性攻击，随即转进热河。

1月中旬，日军自国内大批调兵，集结中国东北，部署热河作战兵力，计有第六师团、第八师团、第十师团一部、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骑兵第四旅团，关东军直属部队以及飞行队，海军第二遣外舰队等部约4万余人，另有伪军张海鹏等部协同，为“满洲事变以来最大规模的作战”。^①

日军的作战计划是：首先进攻热河东北部，牵制中国军队于热河北部，再向南部进兵，遮断其同河北方向的联系，最终将热河境内中国军队压向西面或西南面聚而歼之。其部署北路由第六师团主力自通辽出发向开鲁、赤峰、多伦进击，一部兵力从朝阳寺向建平、赤峰方向进击；中路由第八师团主力进攻承德及古北口，扫荡境内中国军队并占领罗文峪、马兰峪等关口；另有独立混成等三十三旅团集结于沈阳附近，准备开进，各方面还配有伪军。关东军飞行队协同作战，海军担负山海关秦皇岛方面警戒。第十师团、第十四师团及独立守备队分别担任辽、吉、黑方面的守备任务。^② 中国守军按北平（军）分会制订的计划，在热河担任直接防守的有万福麟第四军团部所属第五十三军、汤玉麟第五军团部第五十五军、张作相第六军团部第四十一军等共约8万余人。

2月17日，日军正式发动大规模进攻，北路守军一部为汤玉麟部骑兵第七旅，旅长崔兴武接战即降，影响全线迅速崩解。日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36页。

② 日军参谋本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第71～73页。

军进占开鲁、兴隆、下洼等地。3月2日进攻赤峰，守军孙殿英部第一一七旅经过顽强抵抗，战至次日失守。在朝阳方面因汤玉麟部下一团长投敌，朝阳于2月25日失守。万福麟部所属第一三〇师于兆麟部在叶柏寿附近阻击日军，伤亡甚众，3月2日凌晨失守。3月3日下午，日军逼近承德，汤玉麟惊慌失措，调集汽车运载大批鸦片和财宝南逃天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承德，随后向古北口进攻。

热河作战时期，蒋介石集中全力在江西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将北部国防交张学良，而张学良为保存实力仍不作抵抗。2月19日国民政府曾决定在热河组织两个军团，分别由张学良与张作相统率保卫热河。而张学良拖延张望，直到热河失守尚未成行。至此，日军便以微弱的伤亡，在10余天时间内便击溃了派系林立、混乱丛生的东北军，占领了热河全境。

进攻长城要隘

日军攻占热河之后，按计划分兵三路攻击长城各要隘。东路进攻重点为冷口、界岭口等地，中路为喜峰口，西路为古北口。古北口距北京最近，是为日军攻击重点。

热河失守后，全国震动，国民政府亦不得不加强北部防御，调第十七军徐庭瑶等部仓促北上，并由北平军分会调整战斗序列和作战部署，将北方各系统地方军队及第十七军徐庭瑶部等编成7个军团、13个军（含骑兵军）、36个师、15个旅、4个炮兵团及军师直属部队，共约25万人。其中一部分守平、津和察东，大部沿长城布防。中国军队没有飞机、坦克投入该方向作战，也没有足够的火炮，甚至连充分构筑阵地的时间也未能抓上，故只能凭藉简陋兵器与自然地形进行防守，古老的长城，也成了抵御日本现代军事力量的主要依托工事，这就是当时双方的态势对比的一种特征反映。

在东路的界岭口，日军混成第三十三旅团于3月12日自绥中

长城战役要图
(1933年1月1日~5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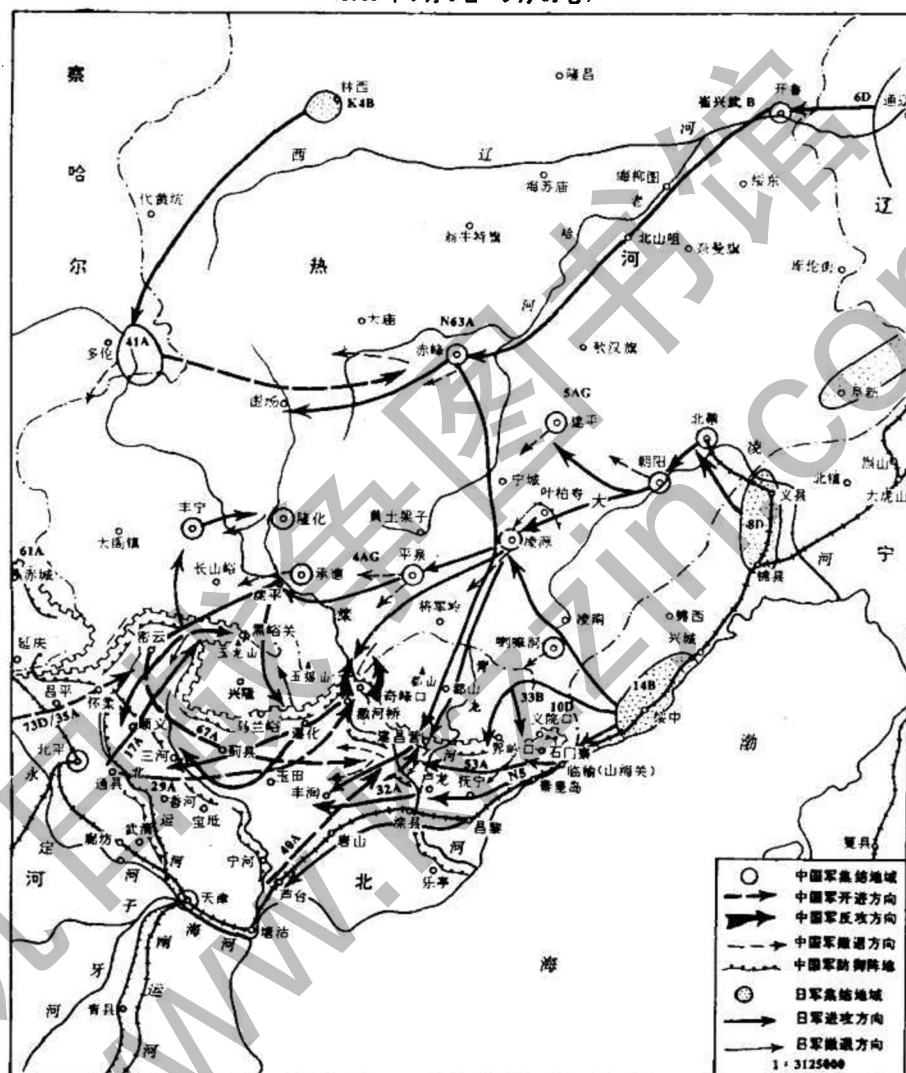


图 13

进攻界岭口，将守军万福麟部第一一六师缪澄流部击退。但 17 日第一一六师组织反击，占领了两侧长城敌楼，并从正面迫近日军。24 日日军第二次进攻界岭口，守军后撤，形成对峙。在冷口，3 月 4 日日军由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发动进攻加以占领。3 月 6 日商震部第一三九师反攻，战至 7 日日军败退。3 月 19 日日军再度猛攻冷口失败，退至口外 10 余公里的马道沟、肖家营子等地，对峙到月底。

中路喜峰口，地形险要。3 月 9 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发动进攻，夺占口门，守军万福麟部被迫后撤，恰由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先头部队赶到接防，堵击日军，稳住了口上战局。10 日和 11 日，日军向口门两侧阵地发动进攻，第三十七师顽强抗击，打成拉锯战，日军攻势受挫，双方伤亡惨重。11 日晚，守军决定趁日军疲惫之际发动夜袭，由第一〇九旅赵登禹旅长带伤率军攻击日军右侧翼，第一一三旅佟光泽部攻击日军左侧翼，第一一〇旅王治邦部担任正面出击。日军正在睡梦之中，支队长植田以下被砍杀甚众，野炮被毁 18 门，这是日军自热河作战以后首次遭受沉重打击。其后日军暂时放弃对喜峰口附近的进攻，急调第八师团第四旅团和骑兵第三旅各一个联队，由部分伪军协同，攻击喜峰口左后方的罗文峪。该地在喜峰口与古北口之间的长城凹入处，若该处被占，喜峰口必然不支。3 月 16 日日军发动进攻，守军第二十九军暂编第二师刘汝明部，连续三天抗击由飞机火炮支援下的日军步骑兵进攻，师长刘汝明亲率手枪队督战，日军败退。18 日夜，由李金田旅长率一个团攻日军左侧背，祁光远团绕攻其后，正面守军也配合发动攻势，战至天明，日军败走罗文峪北 10 公里之外。喜峰口和罗文峪的作战胜利，使日军的中路攻势受挫，日本国内舆论也受到震动。此战第二十九军亦有巨大伤亡，占参

战兵力 1/3 约 5000 余人。^①

西路古北口，距北平最近，战略意义最为重要，为日军攻击重点。日军攻占承德后，由第八师团第十六旅团及骑兵第三旅团一部追击溃败的东北军，3月10日进逼古北口，并以飞机轰炸同日赶到接防的中央军第十七军第二十五师关麟征部，作试探性进攻。11日，日军第八师团向守军发动总攻，由于东北军第一一二师张廷枢部未尽力抵抗便放弃第一线阵地，致使日军迅速占据关口，包围第二十五师驻守的龙儿峪阵地，师长关麟征率一部驰援，并带伤指挥部队，将日军击退。12日战况更为激烈，在日军飞机大炮轰击之下，守军伤亡惨重，阵地通讯联络被切断，大部阵地失守。第二十五师残部撤至密云整补，由第二师接替南天门附近阵地。第二十五师第一四五团所派出的一个军事哨所在大部队撤离之后，仍继续抵抗，先后毙日军 100 多名，后哨所被日军的飞机和炮火炸平。日军对这军事哨所的英勇精神亦十分敬佩，曾将 7 名尸骨埋葬起来，并称“支那七勇士之墓”。^②第二十五师于该年 1 月编成，装备除迫击炮外，山、野炮全无，仅以 4 个步兵团阻击日军第八师团及骑兵第三旅团主力，激战 3 昼夜，毙伤日军不下 2000 人，而第二十五师伤亡 4000 余人，日军承认这一战役为“激战中之激战”。^③

对长城南及关内地区作战

日军在燕山山地作战虽然攻占了古北口等长城要隘，却已无力在该方向继续作大规模进攻。同热河的情况不一样，中国军队士气很高，作战顽强，日军受到了沉重的创击。日军战史记载：“远较中国军队更为劣势的关东军，战斗力已经用尽。”而中国军

① 何基沣：《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的抗战》，见《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 447、451 页。

② 杜聿明等：《古北口抗战纪实》，见《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 490～491 页。

③ 杜聿明等：《古北口抗战纪实》，见《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 490～491 页。

队“在平津地区集中，其兵力约20个师，并在全线不断发动进攻力图夺回其失地”。因此，日军企图以新的作战行动挫败中国军队，“不予中国军队充裕的反击时间”，^①并为此目的而调整进攻方向。

日军在燕山山地作战，坦克等机械化武器的作用受到较大限制。严重的是补给问题，如古北口方向作战，日军不得不动用飞机“空运山炮炮弹”，^②但没有大型运输机，机场也很难构筑，关东军“为火急之需求或僻远之地的补给”组建了一支空中运输队，而“日运量二吨”，^③远不能满足需要。因此“随同长城一线附近战斗的开始，供给方面之缓急状况为之一变”，经常可听到这样的抱怨：“自出发以来即开始忍受饥饿这都可以理解，而战斗中没有枪弹这实在很恼火。”^④日军担心“通过险峻的热河省的补给线容易被击断，战局将会出现逆转”。^⑤所以，补给问题形势严峻，对其作战方向作出调整实属必然。

5月26日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关东军要继续以武力强制为基调”，“使现有的华北军宪当局在实质上屈服”，并“日益助长华北、华中、华南等各方面的分裂倾向”。按上述方针而命令关东军“断然在沿长城地区对中国军队反复进行彻底的打击”。^⑥

日军对长城南及关内地区作战计划是，分兵两路展开钳形攻势：西路以第八师团主力继续进攻古北口方向直至石匣镇附近，“尽力消灭中央军”；东路以第六师团主力进攻迁安上游地区，另以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主力、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所指挥的步兵第

①（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36～337页。

②（日）《现代史资料》11，《绪·满洲事变》，第812、816页。

③（日）《现代史资料》11，《绪·满洲事变》，第812、816页。

④（日）《现代史资料》11，第809页。

⑤（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36页。

⑥（日）《现代史资料》7，第515页。

五十联队主力、第十四师团骑兵一部及炮火联队主力等部统归第六师团长指挥，担任滦东等地作战，并以关东军飞行队为协助。^①进攻重心摆在东部平原地区。

5月7日东路日军分数路自山海关石门寨、建昌营等地出发，以飞机大炮火力猛袭，再度攻入滦东区，5月9日先后攻占抚宁、迁安、卢龙等地，迫守军王以哲、何柱国部西撤。日军第六师团主力5月12日渡过滦河，相继占据滦县、遵化、玉田、蓟县、三河等县城，逐渐推进到蓟运河一线。西路日军第八师团5月10日向退守新开岭阵地的中国军队发起猛攻，经过古北口、南天门等地苦战的第十七军第八十三师、第二十五师及第二师再度轮番上阵，抗击日军。12日傍晚日军坦克10余辆冲入守军炮兵阵地，守军被迫于13日退至怀柔和顺义等地，第八十三师师长刘戡悲愤不已欲自杀，被部下劝阻。山西军第五十九军傅作义部奉调阻击日军，激战数日退守顺义、怀柔以北山地。至此，日军抵顺义、通县、香河等地，距北平仅数公里，构成对北平的三面包围态势。日军飞机不时在北平低空隆隆飞过，进行侦察、示威。北平军分会没有更好的抗战办法，准备撤守保定。

停战指导及其得失总结

日军对华北方向作战，自1933年1月1日攻击山海关开始，前后约近半年时间，完全占据了辽西走廊、燕山山地及冀东平原。华北大平原已无险可守，北平更是三面被围。日军取得军事胜利。

日军获胜原因甚多，其优势火力如飞机、坦克、装甲车以及汽车运输、无线电通讯等都是中国军队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在空中力量方面，日本拥有绝对制空权。其空中力量不但用于对华北各地播撒传单、示威及运输等方面，还广泛使用于侦察、联络、战场轰炸等战术用途，“每当突破坚阵之时，便使用重型轰炸机队

^① （日）《现代史资料》7，第541页。

加以轰炸，在渡河作战中则投入轻型轰炸机队轰击敌阵地、掩护己方战斗队，十分有效”。以飞机轰击为先导，继以步兵、战车协同进攻，以极猛烈火力造成恐怖气氛，守军“意气沮丧，战斗力萎缩”。日军还认为，日方所拥有的飞机等先进武器所造成的后果“在精神上的效果更大”。^①

面对日方的现代武器装备，中国军队连步兵轻武器亦十分缺乏，中央军第二十五师调到北平时没有御寒棉衣，赤足穿草鞋，连轻机枪也没有配上。中国所拥有飞机本来极少，而华北战场则无法派上，故同上海方面不同，日军注意到“中国军队飞机没有出现”。作为地方军的第二十九军装备一部分是汉阳造步枪，还有相当部分是毛瑟枪和土造枪，弹药无法配发。步枪上的刺刀也配备不全，便打制一些大刀，以资补救。战时仅有一点弹药打光了，干脆将土枪扔掉，提着大刀在山地上反复冲杀，大刀在喜峰口、罗文峪战斗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补给方面，日军的战斗部队与后勤系统各司其职，运输以汽车为主，辅之以飞机和骡马，自北票到朝阳的轻便铁道长15公里，只用了10天左右即铺设完备。^②投入守护交通线和各兵站的兵力达两个旅团。^③其后为控制长城要隘，又修筑了直达古北口的穿越燕山山地的铁路干线。中国军队方面，由于军制不健全，组织混乱，战斗部队的补给大部分只能靠自己就地筹措，粮秣运输全靠牛车骡马等畜力。由于工具奇缺，驻守岩质山顶的部队无法施展作业，只能依托表浅掩体作战，在日军的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下，尚未接敌便伤亡惨重。

在通讯联络及情况侦察方面，日军凭藉技术优势，对中国军

①（日）《战史丛书·中国方面陆军航空作战》，朝云新闻社，昭和58年，第6～7页。

②（日）《现代史资料》11，第802页。

③（日）《现代史资料》11，第797页。

队的动向掌握十分清楚。而中国内部政治混乱，民心浮动，生活条件极差，又为日军收买汉奸刺探情报提供了便利。例如北平军分会3月20日给何柱国的撤退命令，平津地区的日方报纸能够在次日就加以清楚地报导。^①中国军队将领却经常对日军情况不甚了了，如热河之战，张学良不思固守，东北军望风溃败，对于日军兵力、作战部队以及作战经验教训等，“张学良本人也不十分了解”。^②再如古北口防御战，守军第二师师长黄杰认为日军穿皮靴不便登山，只用一个排防守制高点八道楼子。日军收买汉奸带路，利用守军疏忽迅速加以攻占，致使守军整个防线遭受瞰击之苦，是为南天门战斗失利重要因素。

在整个热河及长城作战时期，中日两国在作战意志方面还存在巨大差别。中国政府采取了不同于在东北“绝对不抵抗”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政策，但重心在于交涉，力避战事扩大。这不但决定了国民政府最终采取了妥协屈辱政策，还严重地影响了战略战术的采用。如第十七军在古北口方向抗战，其下属部队曾自发组织别动队，袭击日军侧后阵地及供应线，而何应钦却责备各师长说：“你们这样干，会惹起敌军进攻的，你们不出长城口去打他们，他们是不会大举进攻的。”军长徐庭瑤也持相同的态度。^③采取这种纯粹“应战”式的打法，实际上是捆住了劣势装备的弱小军队的手脚，在军事上最为失策。克劳塞维茨早就指出过，防御是一种较强的战争手段，一支弱小的军队可以采取单纯抵抗以达到“延长军事行动的时间以消耗敌人”，但是“等待不应该成

① 黄绍竑：《长城抗战概述》，见《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390页。

② 杜聿明、郑洞国、覃异之：《古北口抗战纪实》，见《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86页。

③ 杜聿明、郑洞国、覃异之：《古北口抗战纪实》，见《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92页。

为绝对的忍受”。^① 在长城抗战中，装备同样落后，却抱有顽强和主动的作战意识的第二十九军所取得的战绩，就是很好的例证。

中国军队消极应战，日军则全力挑战，故日军有利则进、无孔不入，在作战指挥方面远较守军更为主动灵活。占山海关之后即转进热河，置消极株守的守军北戴河主防线于不顾。当守军主力依托古长城在燕山山地顽强抗战时，日军再度以重兵迂回冀东，侧击守军薄弱部位。由于作战重心左右变化，虚虚实实，使守军防不胜防，无所适从，完全陷于被动挨打之境。

日军虽然取得上述作战胜利，但是，中国军队在长城一线毕竟有数十万之众，东北义勇军大规模抗战至1932年达于高潮。中国抗战潜力绰绰有余。日军当时尚未完成大规模动员，投入长城作战的部队相当疲劳。要同时兼顾在东北的反游击作战和在华北的对中国正规军作战，显然要付出相当代价，国内体制也需作相当的调整。日军对形势的综合判断为：“同中国军队相比极为劣势的关东军作战力量已经耗尽。”^② 因此，日军决定，收买华北地方实力派，分割或吞并华北，以政略手段弥补武力之不足。同时决定其作战指导方针：“有必要乘此战胜之势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停战，唯恐给予中国军队以反击的余暇。”^③

5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宣布：“中国军队此时如果能断然放弃历来的挑战式态度，从国境线（伪满洲国）远远撤退，我军将迅速归复长城线。”^④ 日军开口允许谈判，这正是国民政府求之不得的。5月22日南京政府派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与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佐比重秘密谈判，达成初步协议。30日由中国华北当局代表、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

①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商务印书馆，第63～64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37页。

③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37页。

④ （日）《现代史资料》7，第516页。

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在塘沽谈判，冈村宁次拿出日方早已准备好的协议草案，声明是不可更改的最后案，史允许中方以肯、否二字作答。

中方代表被迫完全屈服，按日本要求作了肯定承诺，于5月31日正式签订《塘沽协定》，主要内容有：第一，划出一条联结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等地之“停战线”，中国军从该线撤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第二，日本军队为证实第一项实施情形，可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第三，日本军队如证实中国军队确实已撤出停战线，可以停止追击”，“并自动回至长城线”。^①此外又以所谓“口头希望”，逼走丰宁西南守军骑兵第二师、平津附近守军，拆毁白河河口军事设施，等。

随后日军通过“善后会谈”，迫中方同意日本提出的《关于华北善后交涉议定案》：（一）长城各口由日军负责警备；（二）满洲国得在长城各关隘设立必要的机关，中方应予以承认并给予最友善的援助等，造成长城重要关口由日军控制，小口由“满洲国”掌握，伪满还公开竖立界碑、收缴“出入境关税”。国民政府外交机构承认：“虽谓为停战协定之善后，其内容却超过军事协定之范围而成为政治性要求。”它打破了蒋介石原来设想的在长城问题上不涉及政治主权的外交原则。^②

塘沽协定及其善后协定作为屈辱的城下之盟，激起了中国民众的义愤，中日民族矛盾更为上升，冲击了中国国内政局，多种矛盾冲突进一步激化。而日军则利用该协定，继续控制长城要隘，在古北口等战略要地屯集重兵，完成并改善了横亘华北平原北部山地的陆上封锁线，它与驻平、津两地的驻屯军相呼应，整个冀

①（日）《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原书房，1969年，第274页。

② 吴东之：《中国外交史》第二册，第293页。

东地区实际成为日军的囊中物，平津两城唾手可得。

更重要的，这条陆上封锁线与东部海上封锁线相配合，直接围困住中国的华北平原、华东长江三角洲两大政治经济中心区，中国的战略态势变得更为脆弱。日军有得必进，步步紧逼，终将走向全面对华战争。人类的战争史已经表明，力量与态势的对比愈不平衡，战争愈易发生。因为处于有利的一方往往更敢于发动或扩大战争。故石原莞尔认为塘沽协定是导致对华全面战争的阶梯；冈村宁次也认为：“塘沽协定虽然对我有利，却可以看出是从满洲事变向大东亚战争的，我之长期对外战争中之最重要的联结点。”^①

2. 反游击作战与打开对苏关系

日本的世界战略与占领地统治方针

日军通过长城作战，其占领地更为扩大，以其满蒙政策所圈定的地域为中心，包括了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大部及长城一线。日军在占领地区的统治方针，同其世界战略有着紧密的联系。

1933年，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由石原莞尔起草的《由军事上看皇国之国策》，强调：“满洲国之成立为中日亲善、亚细亚团结之基础。”同时炮制《皇国国防计划纲要》，强调要以“日满华之国为基本范围实行自给经济”，^②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日军对外战争政策得到强化，参谋本部提出的《国防国策大纲》草案，其中第一条强调：“一、皇国在经济方面的要求，期待于中国及南洋之处虽多，但满洲国实为对苏联之军事、政治据点。当前国策之

①（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38页。

②（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78页。

重点在于完成满洲国之建设，俾使苏联放弃远东之攻势。”^①

对于上述草案，在征求各方面意见时，海军方面曾强调发展海军军备，对上述将发展重点放在满洲地区之建设表示了不同意见，但由于石原莞尔提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要职，陆军对满蒙地区的政策除在实际中加强推行，还在决策中继续得到重视。1936年6月30日参谋本部提出并得到海军军令部的同意制定了《国防国策大纲》，其中强调：“一、皇国之国策首先在于确立东亚保护、指导者之地位，为此，必须具备排除白人压迫东亚之实力。二、为对抗苏联及英、美之压迫，充实所需之军备，特别是航空军备，以及在日满及华北范围内完成持久战争之一切准备，至关重要。”^②巩固对满蒙地区的统治，是日本当时对外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

日军占领上述地区，主要是占据交通线和城市，边远的山林乡村大多成为抗日武装的地盘。因此，日军强化其对占领区的统治，首先是进行反游击作战。待塘沽停战协定成立后，6月，关东军即全力专注于在全满洲“恢复治安”，尽力将各兵团“分散配置进行积极的讨伐作战”。据统计，日军在东北对付民众游击作战次数最多的为1935年、1936年和1937年，而其中取得“讨伐”战果最大，即抗战力量伤亡最多的3年依次为1935，1936，1934年。^③于此可见，日军在上海方向及长城南北地区作战决定加以中止，原因盖在于集中精力平定东北。东北占领区为日军对外扩张的最重要战略基地，巩固以东北为中心的占领地区殖民统治，是扩大新的对外战争之基础。

日军在东北占领区对付抗战力量的战略战术，为其后来全面侵华战争时期在更为广阔的占领地区内对付抗日游击力量，提供

①（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81页。

②（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88页。

③ 江口圭一：《通向卢沟桥事件之路》，见《中日学者对谈录》，第94页。

了重要依据或模式。同时，对占领地区抗战力量残酷镇压，也表明了日军将不惜一切地坚持侵华军事方针，将使战争不断升级。日军在东北的反游击作战是其侵华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军为抗日游击战困扰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力图保存实力，奉行与南京政府一致的不抵抗政策，拱手让出了东北；而广大爱国官兵和民众则举起义旗，进行武装抗日，具有广阔的民众与社会基础。因此，日军占领东北后进行反游击作战，较攻占东北时受到更为沉重的打击，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大致可以划分为3个时期：

第一时期，自1931年9月到1933年初，为义勇军战争时期。义勇军是东北各地人民自发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它没有统一的组织指挥系统，各部队的名称番号也经常变动。其来源大多出自东北军各部队，或山林、铁路警察，或民间武装会社如红枪会、大刀会，还有相当部分爱国的地主武装、绿林武装等，而首领则多是东北当局旧军政人员。

北部黑龙江省马占山部是义勇军中最著名的一支队伍。成立有黑龙江省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马为黑省省主席并兼任总司令，下辖10余路军共约6万余人。黑龙江另一支较大队伍是原任呼伦贝尔警备司令等职的苏炳文部、汇同原省防军炮兵团朴炳珊、卫队团徐宝珍等部于1932年10月1日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苏为总司令，主要活动区域为海拉尔、札兰屯等地。黑省地区还有李海青的“东北民众自卫军”等部。

东、中部吉林省地区的义勇军部队主要是由原吉林省军政官员李杜、丁超、冯占海等人组成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的“吉林国民救国军”，姜荣跃的“吉西抗日军”，田霖的“吉林人民抗日军”等部。

黑、吉两省义勇军经常相互合作，共同攻击日军。1932年马

占山与李杜等人协议，联合作战收复哈尔滨。由李杜部进攻哈绥路上日军，李海青部截断南满铁路并进攻长春，马占山则率部进攻哈尔滨。开战后珠河车站一役，由于上万民众协助，红枪会、大刀会赤膊爬上日军装甲车与敌肉搏，歼日军 200 余人，伪军 1000 余人，俘伪军 500 余人，取得胜利。^①日军遭受沉重打击，急调第十师团防守哈市并采取攻势以主力攻击吉林自卫军大本营依兰，继调第十四师团进攻马占山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亦亲到绥化指挥作战。由于力量对比悬殊，两省义勇军功败垂成。

辽宁省义勇军成立最早，人数亦最多。其中力量最大者有由原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等人的“辽宁抗日义勇军”，后改称“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辽宁各地义勇军相继归其指挥，总部设于北票，兵力最多时达 20 余万人。他们曾在锦州地区配合东北军阻击日军，歼灭了由日本特务仓冈繁太郎支持的汉奸伪军凌印清部。辽宁各地义勇军部队还有以海城为中心的李纯华“东北义勇军”，以凤城、岫岩一带为中心的邓铁梅、苗可秀“东北民众自卫军”，辽东地区的唐聚五、邓秀岩等人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以及高文彬等人建立的“辽北蒙边专员行署”组建了辽北蒙边义勇军骑兵团，等等。

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高潮的 1932 年，人数达 30 万人以上。^②他们在东北当局退出东北的情况下，凭藉少量枪支甚至大刀、长枪等武器，以奇袭、伏击等游击战术自发行动，在东北各地给予了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据不完全统计，在辽、吉两省较大的作战活动，有进攻沈阳 11 次，进攻长春 6 次，烧毁了沈阳、哈尔滨两地飞机场，破坏了抚顺日本发电所，等。^③1932 年日军伤亡达 3 万

① 见《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 279 页。

② 王化一：《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和失败》，见《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 232 页。

③ 《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6 号，第 56 页。

余人，^①另有统计记载，直到1933年2月日军尸体运回日本平均每月约50具。^②日本战史记载，1932年夏“铁路几乎中断，对于南满铁路，有人建议夜间停止运行，沈阳也处于‘兵匪’的威胁之中”。^③

义勇军失败后，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等人退入苏联境内，冯占海、黄显声等部转进关内，冯部编为中央陆军第六十三军。其余有的转入人民军、抗日联军等行列，或以其它方式继续进行游击战争。

第二时期，自1933年9月到1936年2月，约两年半时间，为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发动的人民军时期。中共满洲省委在中央指示下纠正了1932年北方会议的错误，暂停土地革命运动，取消已建立的苏维埃和红军游击队，提出在东北“建立选举民众政权”和组建“民众革命军”口号，克服了左倾关门主义，逐渐打开了新的局面。于1933年9月在原南满游击队基础上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由于作战连续获胜，队伍不断扩大，1934年2月成立江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约5000余人，活动地盘约20余县，同年11月正式建立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还打通了同东满抗日游击队伍的联系。

其后于1935年5月30日以东满抗日游击队为基础编成人民军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1935年1月28日以原珠河抗日游击队为基础编成第三军，军长赵尚志，著名烈士赵一曼（女）生前曾兼任该军第二团政委。1934年3月20日在密山地区编成第四军，军长李延禄。1935年2月10日以原绥宁反日同盟军为基础编成第五军，军长周保中。1936年1月30日以汤原游击总

① 井上清：《昭和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7页。

② 《东北四省四年来的反游击战争》，见《救国时报》，第5期。

③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34页。

队为基础编成第六军，军长夏云杰。各军人数约 1000 至 6000 人不等。

人民军 6 个军的组建，不同于义勇军时期的抗日部队，他们纲领明确，组织严密，遵守纪律，深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在义勇军抗战转入低潮的情况下，人民军成了东北敌后抗日力量的主力军。

第三时期，由 1936 年 2 月到 1937 年 10 月，为抗日联军建立时期。为争取更大的发展和胜利，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统一指挥和统一编制的抗战部队，经过东北地区人民军各部队将领的酝酿和准备，先后将原人民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至第十一军，共约 4 万余人。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活动范围约 70 余县。抗日联军的建立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高潮。

据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说：“根据我观察，对于能不能预计在短期内把满洲国治安恢复到平静这一问题，很遗憾，我只能说一个否字。”^① 日军在东北地区为巩固军事占领，用于对付爱国军民自发性抗战所使用的兵力，远远大于进攻东北地方当局的兵力。自 1932 年后驻东北兵力总数在四五万人以上，但“计算一下兵力和时间的话，甚至是付出了十倍的努力，仍未能完全达成目的”。^②

保甲、集团部落

日军对付东北地区抗日军民所使用的基本手段，包括政略和战略两方面的内容。扶植傀儡政权实行以华治华，是其政略上首要的手段。为此，日军抬出清朝废帝溥仪作为伪满洲国首领，继而又改称皇帝，以其号令全东北。同时又在各地威逼利诱部分有

① 《世界历史》28，岩波书店，第 280 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 345 页。

名望者，委以大小官职，令其为日军的殖民统治服务，完善政治统治机构。

为了牢牢控制民众，日军令伪满政府于1933年12月颁发《暂行保甲法》24条，1934年2月公布《户口调查规程》，1934年3月重新改定《暂行保甲法》，让居民实行十家连坐。1935年7月制定推行保甲制度的3年计划，决定在3年期间分别在50, 49, 60个县内贯彻推行，最后将在东北全境普及贯彻保甲制度。

游击战争的开展与民众关系甚大，因此日军千方百计切断抗日军队同民众的联系，“集团部落”就是其重要措施之一。所谓集团部落，是以暴力手段强迫分散居住的农民群众举家搬离，迁住由日伪指定的新地区，组成由日伪警察直接控制的大村落，并放火烧掉原住居民房，制造无人区，以隔断抗日部队同民众的联系。自1934年12月3日正式发布建立集团部落命令后，到1936年底据统计共建立4433个。^①每个部落一般规定为100~200户，部落周围挖有深沟，沟旁修筑土墙，沟外再拉上铁丝网，四角修有炮楼，安插有警察、特务监视，每部落只有一个出入口，进出须出示居住证明，并强行搜身检查。日伪军警还在部落内组建“自卫团”、“协助会”等伪组织，强迫居民参加。

日军还实施最严格的经济封锁，以切断抗日力量的补给。严格控制集市上的商品物资买卖，特别是布、棉花、食盐、粮食等物品，凡为抗战部队购买上述物品者一律以通匪罪格杀勿论。集团部落居民外出耕作也不准携带较多的粮食或食品，不准远离部落。秋收时严格核查地亩与粮食数量，防止农民暗留粮食接济抗日队伍，等等。东北地区冬季长，气候严寒，野外生存条件差，严酷的经济封锁对抗战力量造成了很大威胁。

打开对苏关系

^① 陈本善等：《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第398页。

排除各国在东北的势力，调整伪满政权的对外关系，也是日本巩固对东北殖民统治的一项重要政略措施。由于英美等国表示了对伪满政权的不承认主义，谴责日本的战争行动，日本退出了国联，拒绝英美等国对伪满的干预。

在东北问题上关系最大的是苏联。苏联在东北所拥有权益仅次于日本，日苏两家多年来既有协商更有争夺。日本攻占东北北部地区之后，日苏双方在中东铁路、边境等方面发生了新的摩擦和冲突。苏联的基本方针是继续维持其自身利益。起初采取的是“严守中立”政策，苏外交人民委员会于1931年11月20日向日本表示：“苏联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也要维护两国间的现存关系，并将在其所有活动和决定中考虑不违背苏联的利益”，^①随着日本军事占领的巩固，苏联的态度随之变化。1932年苏驻日大使以及苏联外长李维诺夫主动提出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但上述“友好表示”未能满足日本的扩张胃口，日本反应冷淡。苏继续让步，在中东路运输方面，为日军部队调动提供半价或记帐付款等优惠，继而表示可以转让中东路，承认伪满洲国。日本终于发现了苏联的“诚意”，由于看出“苏联没有介入满洲事变的意愿这一判断得到肯定，关东军也就感到放心而专致于事变的处理”。^②

日本对苏外交所取得的最大收获，是从苏联手中低价购得中东路。两国自1933年6月25日开始谈判，1934年10月达成协议，1935年正式签署。苏联终于无视中国主权，将中东铁路单方面决定以总值1.7亿日元的较低价格转售给伪满洲国，实质承让了伪满傀儡政权。苏联在20年代同中国谈判时，曾以高于日本支付价格数十倍的要价，拒绝了中方购回中东路的正当要求，继以

①（苏）葛罗米柯等：《苏联对外政策史》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18页。

②（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39页。

战争手段进攻中国，维持其权益。但在日本军事机器的淫威面前，却如此主动让步，支持了日本的战争行动，对中国无论在战略、外交诸方面，都造成了新的严重困难。

由于苏联主动配合，日本抓住时机在东北改善了孤立和被动的对外关系，控制了包括中东路在内的所有交通线，战略地位改善，有条件更好地推行“点线”战略，在东北的反游击作战因而在1935、1936年间达于高潮。当日军在东北的军事作战及殖民统治等方面理出了头绪之后，日军调头南下，在华北大规模扩张，造成“华北事变”，中日关系再度恶化，向着全面战争事态演变。

反游击作战的战略战术

日本将对付抗日游击力量的政略手段看作“治本”，将军事镇压视为“治标”，但军事镇压却是日军最主要最常用的手段，不断制订各种“肃正”、“讨伐”计划，对抗日力量分期分批、按地区突出重点地进行武装征剿。冬季地面冰冻，有利于机械化部队运行，而游击力量的野外生存条件却十分困难，这往往是日本发动大规模镇压作战的时期。

日军对游击力量作战的基本原则是每战集中使用兵力。抗战力量由于民众支持人数众多，但组织分散，形不成拳头力量，在义勇军抗战时期尤其如此。日军每战不惜以牛刀杀鸡方式，集中飞机、坦克和大炮等武器对付义军，从而在每次作战中力争兵员上的最大可能的数量对比，并保证火力上的绝对优势。

日军再一个作战原则是攻势作战，包括临时应战式和有计划的对抗战力量作战。如1932年4月马占山的黑省义勇军联合吉林义勇军李杜、丁超部进攻哈尔滨等地，其中曾由吉林义勇军取得珠河、宾河等地作战胜利，声势十分浩大，日军急调第十师团抵达哈市，以进攻对付义勇军的进攻。日军另一路奔袭吉林军后方根据地依兰，掳掠了义勇军的全部被服、粮秣、武器等辎重。各路义勇军陷入困境，加上内部发生冲突，终于溃败散去。

日军另一个战略原则是，每战突出重点，各个击破。由于义勇军组织上不统一，客观上为日军提供了条件。日军击溃吉林军主力之后，得知马占山部还在庆城一带活动，即派第十四师团主力前往围剿，本庄繁亦亲自前往指挥。马与优势日军周旋月余，终被击溃。10月，苏炳文在海拉尔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日军第十四师团向西继续推进，集中飞机、装甲车、大炮沿铁路进攻，苏炳文经抵抗作战后率残部4000余人退入苏联。对于分散各地的小股抗战力量，日军则制订详细计划按期进行有重点的征剿。这种有重点的作战（围剿），保证了日军每次作战尽可能多地集中兵力和火力，保持了优势。

日军还充分利用伪军协同作战，伪军不但弥补了日军的兵员劣势，还在地利与民情方面为日军提供帮助。陆军省1933年9月制定《满洲国陆军指导纲要》，1934年还颁布《募兵法》，对伪军加强整组，到1936年编为6个军管区，兵力达8万人。日军通过设立顾问部指挥伪军，并直接派员担任伪军各级指挥官。

日军的作战部署与兵力配置根据不同时期而有所调整。在伪军与伪警察体系建成之后，1934年正式改分散配置为集中配置，由伪军担任各地的警戒和对付小规模游击作战。日军的集中配备，减少了由于分散配备而遭受袭击的危险；发现大股抗战力量时，再凭借有利的交通机动条件快速进行大规模围剿。在东北地区平原广阔，铁路、公路交通发达的条件下，这也对抗战力量造成了极大威胁。

牢固控制了各交通线与城市、军事要地，即通过控制城市据点和交通线而分割围剿乡村和山林地区的抗日游击力量。这种战法在历史上曾被使用过，如清军为镇压具有高度机动性的捻军骑兵部队，采取“划河圈地”战法，即分割战场为若干易于控制的小块区域而进行堵剿。这种战法的实质是以“点线”对抗“面”。

这是日军在东北，其后又在华北等关内地区广泛使用的战术。

控制交通，保持机动，是点线战略的先决条件。日本以低廉价格从苏联手中购得中东铁路，这就完全控制了东北地区的交通干线，同时又大量投资建设新线路。1933年日本修建的主要线路有图们——牡丹江、口北营子——凌源、北安——二站，1934年有牡丹江——佳木斯、凌源——承德、叶柏寿——赤峰、二站——黑河、新京——大赉、大赉——洮安、怀远——索伦、林口——密山，1935年新立屯——新邱，等等。到1945年战败时，日本在东北地区共建铁路5300公里，满铁经营铁路总长度11479.1公里。^①这些铁路有的是在对苏战备的名义下修建的，它们对于日本对付东北地区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更发生了直接的作用。抗战力量本来在火力装备等方面处于完全劣势，长处是熟悉地形、有民众支持。战术上多避实击虚、打了就跑。这些长处和战法由于日军加强“点线”分割战场，活动范围和隐蔽程度都受到极大限制，逐渐陷入不利。

总之，从东北地理状况看，平原广阔，冬季冰封时间长，人口相对集中于城镇，野外补给困难，工业和交通均较为发达，这些条件对于游击战争的开展不太有利。尽管如此，东北人民还是以高昂斗志长期顽强抗击了日军的侵掠与围剿，取得了悲壮而巨大的成就。而日本充分利用了上述自然地理条件，以各种方式巩固其占领。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逐渐走向低潮，但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对日本的侵华战略起到了极大的牵制作用，而日军在东北的反游击作战及其战略战术，又是日本侵华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① 满史会编著：《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东北沦陷四十年史编写组，1987年，第190、213页。

3. 对华北的谋略与渗透

“华北政策”的形成及主要内容

日军通过长城作战迫中国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虽暂时停止了对关内地区的军事进攻，但其谋略扩张并未停止。日本对华北的谋略扩张是长城作战的延长和发展。

华北地区当时包括5省（冀、鲁、晋、绥、察）2市（平、津），面积约100余万平方公里，几近于东北地区，是全国主要的棉、麦产地。矿产与工业水平、交通条件都居全国前列。使日军最感兴趣的是“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山东以南的棉”。所以，日本攻占东北之后，便制定了华北政策，并强调要“开发中国本部首先是实现开发华北的方策”。^①

1932年1月28日参谋本部制订的对华全面战争计划中，“华北和山东方面”作战被列为第二位目标。1932年8月27日内阁会议决定《从国际关系看时局处理方针案》，将对华北的侵略政策包含于“对中国本部政策”之中，强调当时日本首要的是巩固对东北的占领，力争消除列国对于日本的“对中国本部政策的不必要的疑虑和惧怕”^②，避免列国乘日本立足未稳而加以干涉。

随着东北伪政权的建立及抗日义勇军转入低潮，日本逐渐巩固了对东北的占领。1933年上半年作战，又攻占了长城南北要地，对华北扩张加剧。5月初，日本下达对华北北部平原地区作战命令，参谋本部同时颁布《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强调其目标是

① （日）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8年版，第107～109页。

② （日）《现代史资料》8，第5页。

“于华北、华中、华南各方面，分别进行促使其更加分立之方案”。^①也就是要尽快地将华北分割控制起来。据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记述，在日本进行长城战争同期，为收买中方要员建立在华北的傀儡政权，日本耗资 300 万日元，该项经费从陆军省机密费中支出。^②

1933 年 9 月，海军省提出《海军对华时局处理方针》，明确使用了“对华北方策”的提法。陆军于 10 月提出《帝国国策》，内阁于 11 月 30 日炮制《帝国外交政策》，都强调要将华北地区从中国中央政府的控制下分离出来。1934 年 4 月 17 日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会见记者并发表公开谈话，将整个中国视为日本的保护国，表示列国对中国“即使在名义上属财政的或技术上的援助”，日本也“不能置之不理”。^③同年 12 月 7 日，陆、海、外三省官员经过协商制定《有关对华政策的文件》，规定“对华北政权方针政策”的宗旨是“形成南京政权的政令不能达及的形势，……不论华北政权主要班底由何人组成，均不能无视在华北的日满华特殊关系。”^④而这时期日本所企求的方案大约有 4 种：1. 华北五省独立；2. 华北自主；3. 设立自治中心地带；4. 设立局外中立裁兵地区。^⑤总之是要脱离中国，转向亲日。1935 年 1 月 4 日，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认为在华北五省存在着反蒋因素，由日本分裂并控制该地区是完全可行的，为扶植“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应该使用“旁敲侧击办法，逐步前进”。^⑥

日本对华北政策的代表性文件是所谓的“多田声明”。1935 年

① (日)《现代史资料》7，第 515 页。

② (日)《现代史资料》7，第 568 页。

③ (日)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 年，第 76～77 页。

④ (日)《现代史资料》8，第 23 页。

⑤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 年新版，第 62～63 页。

⑥ 《申报月刊》，第 4 卷，第 2 号，第 123 页。

9月24日，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司令官多田骏少将就华北问题对记者发表谈话，提出要“1. 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逐出华北；2. 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3. 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还强调为达上述目的“必须改变和树立华北政治机构”。^① 多田提出的上述政策特点在于：是公开宣布的完整方案，范围着眼于整个华北，强调政治上的“分离”及日本的“指导”作用，在经济上更提出了“华北经济圈”的说法，总之是日本对华北侵略政策最完整、全面的概括。作为日本驻华北地区最高军事长官，这一声明，标明日本对“华北政策”已经正式形成。

上述华北政策，重点在于以平津为中心的关内平原地区，在绥远、察哈尔方面日军另有打算。1935年7月25日关东军参谋部制定《对内蒙措施要领》，决定“为了有利于对苏作战，以及为准备作战需要的各项平时工作，同时以巩固满洲国的国防以便于加强统治为目的，关东军首先设法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地区，内蒙应随同华北工作的进展脱离中央而独立”。^② 日军要求内蒙地区对日本有更大的依附性，要承负日军对付苏联及苏控外蒙古的战略任务。在次序与步骤上，1936年1月陆军省制定《对蒙（西北）施策要领》确定当前重点在绥远，其后向“外蒙古及青海、新疆、西藏扩大”。^③ 同月13日还制定《第一次华北处理要纲》，再度确认“内蒙工作其范围应大致限定于长城线以北，且暂不波及东部绥远四蒙旗地域”。^④ 仍然以分离华北为中心和重点。

对华北的各种蚕食手段

在华北政策指导下，日本收买中方政要，扶植傀儡，进行经

①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56～57页。

② （日）《现代史资料》8，第492页。

③ （日）《现代史资料》8，第540页。

④ （日）《现代史资料》8，第350页。

济掠夺，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同时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以逼迫中国就范。1934年10月27日和1935年6月5日，日本制造了两次“张北事件”，对中方进行挑衅。1935年1月借口察省东部部分地区划界问题，勒令中国守军撤退，并于1月22日调集大批日军发动武装进攻。同年6月11日又寻借口向中国守军挑衅，企图迫使中国守军“撤退到黄河以南”。^①最后，日军迫中国政府免去守军宋哲元的察省主席职，改由秦德纯代理，并于6月27日签订屈辱条约《秦德纯土肥原协定》，主要内容有：“将驻于昌平和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之东，并经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至张北之南这一线以北的宋（哲元）部队，调至西南地区”等等。《秦土协定》是《塘沽协定》的继续，它使北平西北方向又一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为日军所控制。

日军对以平津为中心的平原地区加剧蚕食。1935年2月抗日武装孙永勤部进入“非武装区”，日军指责其得到了国民党地方政府庇护。5月在天津的两名汉奸报社社长在戒备森严的日租界被人杀害，据当时舆论分析是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炮制的苦肉计。^②日军以上述事件为借口派出装甲车队在河北省主席办公楼前列阵，飞机在平津上空低飞，向中国施加压力，最后于6月9日迫使何应钦让步，由口头交涉达成所谓“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主要内容有：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职，取缔河北地区国民党党部，取缔蓝衣社及北平政训处等组织机构，第五十一军及中央军第二十五师、第二师等撤离河北，在全国禁止排日运动，等等。“何梅协定”严重削弱了中国在华北地区的主权，实际上已将国民政府势力从华北地区排除出去，造成了政治“真空化”，以备进一步扶植亲日政权。

①（日）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107页。

②（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18页。

日军蚕食华北的又一重要内容是在经济领域进行无处不入的掠夺。1933年11月前后，由关东军、满铁、中国驻屯军等联合组织调查机构、制定计划，对华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情报调查。1934年10月，驻屯军司令部制定《华北重要资源调查之方针及要领》，提出要“助长帝国对华北经济发展，使战时我国国际资源易于补充，同时扶植和增强帝国在华北的经济势力，促成日、满、华北经济圈。”^① 各类官办或民间资本向华北蜂涌而至，对矿业、棉业、电力等领域进行了猖狂掠夺，大批殖民公司如“兴中公司”、“中日实业公司”、“满津贸易公司”等成立。而飞机、铁路、港湾等交通运输业的控制经营，不但为日本增殖了经济利益，更直接地支持了在华北的军事行动。

日本还在金融领域开展货币战，进行殖民掠夺。日本官民商人大规模进行白银走私，印发大量纸钞挤兑银币，北平天津等地银库几被日商罗掘一空。其高潮时，满载银块、银币的骡马队竟如流水般通过各长城隘口，使中国白银哗哗流入日本银库。中国的银本位制货币体系，陷入严重的危机。1935年11月，中国决定实行币制改革，逐渐产生成效，经济形势有所稳定。而日本唯削弱中国为要旨，竟不惜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多次由外务省等军政机构发表强硬声明，反对中国进行币制改革，还进行种种阴谋手段，限制并打击中国货币。在华北则胁迫地方当局推行所谓“自主币制”，制定过多种“自主币制”方案，并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于1936年5月由河北省银行在法币之外印发辅币，而伪冀东亲日政权也在1937年发行了若干伪币。日军通过货币战不但掠夺了中国的物质财富，也在战略上起到了削弱中国国力的作用。

日本还利用庞大军事力量，压迫中国的陆海缉私和税收机关。

^① （日）近代日本研究会：《东亚与日本》，山川出版社，1980年，第161～162页。

日本不承认中国政府冀东海面近岸3海里的领海权，利用其海军力量禁止中国缉私船只通行。日本的走私商团则旁若无人，陆上任意穿行于长城南北，海面则以各种船只乃至200吨以上大船满载货物往来于冀东海面。又使冀东实行相当于常规关税1/4的特低关税，使走私变相合法。南京政府向日本政府所提出的抗议书指出：“综计自上年（1935）8月至本年（1936）4月中国海关税收（指华北各关而言）因日鲜浪人走私所受的损失共在2500万元，而本年（1936）4月起私货运入更加突飞猛进，仅一个月期间关税损失共达800万元之巨。”^①关税是当时经济落后的中国政府重要财政收入，约占税收总额70%左右。关税收入大幅度减少，加剧了财政困难，削弱了国家财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社会亦陷入更大的混乱，为日本进一步火中取栗创造了条件。

“华北工作”的挫败

日本在华北地区纵横捭阖，文武并用，捞到了巨大实惠，但是在组建亲日政府攫夺整个华北地区主权这一最高目标上，却遭受了挫折。日军曾先后拉拢所谓名望者如北洋将领吴佩孚、孙传芳，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以及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等人，均遭到拒绝。日本最后注意到了宋哲元。宋为察省主席、第二十九军军长，原属冯玉祥部。日本认为宋握有很大的军政权力，与蒋有隙，是最好的自治人选。按土肥原设计，成立“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其办法是：“1. 自治领域为华北五省，推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会聘日本人为顾问；2. 由最高委员会主持五省军事，截留五省关税、盐税、统税分配给五省；3. 向确立日满华三国合作经济圈迈进；4. 扑灭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宣扬东洋主义。”^②等等。

为分割华北和促成宋哲元自治，日本曾策划过多起自治叛乱

① 魏友斐：《平衡预算声中的华北走私问题》，见《东方杂志》，卷33，第13号。

②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第65页注②。

事件。1935年6月，由汉奸白坚武在日本特务支持下，收买北平军分会铁甲车队部分人员，在丰台发动武装暴动，企图进占北平，被挫败。8月20日，日本又支持香河汉奸武宜亭等人举行暴动，一度占据县城，设立了为时一周的县自治会。日本最大的成功是在冀东炮制了由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中国政府宣布通缉殷逆，实际却无能为力，蒋介石说：“要讨伐他，就一定会直接和日本冲突，我们现在力量不够，不得不暂时容忍。”^①冀东当时包括唐山、秦皇岛等城市及县城22个，面积约3.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0万。这块土地变成了日本的附属。土肥原认为，通过冀东再作促动，说不定宋哲元果真会屈服。

就宋哲元来说，出于对蒋的矛盾，幻想借外力保障其地位，所以没有明确拒绝日本的拉拢和诱迫。在南京政府方面，在日本多方面强大压力之下，仍企图以妥协换取和平。11月30日蒋介石、林森召开五院长会议，制定处理华北问题六项原则：“1. 实行共同防共；2. 关于币制改革，在华北方面可作适当修改；3. 考虑关内外人民关系密切，对两地经济关系给予方便；4. 在财政方面给华北政权以相当支配权；5. 给予就地合理解决对外悬案权；6. 根据民意录用人才，实行理想的政治。”^②并经日本同意派何应钦从南京赴北平与宋哲元会商，12月5日达成协议，建立半自治性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

总的说来，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国民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产物。委员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本提名的汉奸或亲日分子，下设经济、外交、交通等特种委员会，多由亲日分子把持。对此，日本参谋本部大体上是满意的，“虽然还有些暧昧不明，而在（华北）明朗化方面总是前进了一步”。日本的基本估计是，它将“成为华

① 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60页。

② 《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大事记》，第21辑，中华书局1981年，第184页。

北五省政治上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的阶梯”。^①

但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毕竟同冀东殷汝耕政权有绝大的不同，宋哲元虽然同蒋有矛盾，却是作出过实际贡献的爱国将领，委员会最重要的军政大权由第二十九军将领控制。委员会建立之后，同南京政府的关系反而日趋紧密，尽力执行南京政府指令，逐渐加强了“中央化”。在经济、贸易等领域对日方要求虽有所满足，但在主权问题上态度明确，提出“力保主权”口号，曾派员同土肥原协商，要求日本撤销冀东伪政权，归还察东六县。1937年2月，不顾日本反对，派秦德纯代表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并宣布“冀察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政策”。^②宋还释放爱国学生，在学校开展军训，继续坚持对军队的抗日爱国教育，第二十九军军事训练长期以日军为假想敌而进行。甚至在对日让步最多的经济领域，也在新建铁路、采矿和土地管理等方面抵制了日方贪得无厌的索求。因此，日本企求于宋哲元的对日“明朗化”完全落空，越来越不满意，转而策划驱逐宋哲元。可以说，由于以宋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活动，日本策动中方要员脱离南京政府，建立亲日傀儡政府的政略目标从根本上落空了。于是，转而以武力解决华北问题，成为日本新的抉择。

华北危机中的中国政局变化

日本侵华扩张的不断升级，极大刺激了中国社会矛盾发展，促成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国民政府在东北问题上奉行的是诉诸国联的“不抵抗主义”，而在长城抗战时则转向“一面交涉，一面抵抗”。随着日本在华北地区扩张加剧，其对日政策也日渐明确。1935年6月21日蒋在致何应钦电报中说：“华北实已等于灭

① (日)《现代史资料》8，第128~133页。

② (台)《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第8页。

亡”，“今后对日再无迁就之必要”。^① 强调对日妥协让步的极限是平津地区的存亡。同年 11 月 20 日蒋曾针对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电告商震：“如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依违之可能，当下最后之决心。”^② 同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蒋声明：“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在最后关头”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1936 年 7 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又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做最后之牺牲。”声明在对日妥协的“最后关头”之后，中国必将决然抵抗。

随着政策的变化，国民政府也作出了相应的行动。长城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加紧整备军事，购买德国武器，计划在 1938 年前训练出 60 个整编师，又筹办长江防卫工事及在江浙等地的国防工事，1936 年大致完成了第一期工程。1935 年蒋介石到达四川，发现了四川的战略价值，认为如将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统一起来作为根据地，日本“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国”。^③ 后来定重庆为陪都，将沿海工业大量内迁。为增强国力，不顾日本公开的干涉和阻挠，在 30 年代初“废两改元”统一币制基础上，于 1935 年废除银本位制，统一使用法币，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所促进。在对日外交上，围绕日本提出的“广田三原则”进行的邦交关系谈判中，态度也渐趋强硬，提出要从东北问题谈起，强调领土完整，日本企图落空，谈判陷入僵局。

为对付华北方面危局，蒋下令通缉汉奸殷汝耕，调集部分军队至津浦、陇海等线，命令在河南方向赶造船只，以备运兵之用，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 688 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 714 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 745 页。

作了备战的实际部署。1936年5月日本扶植伪“内蒙军政府”，中央军汤恩伯部曾换用晋绥军番号，开出雁门关，驻守平绥路要点集宁。8月，日本以飞机坦克配合伪“内蒙军政府”侵犯绥远，企图攻占绥远省会归绥。11月日军进攻格尔图，绥远守军傅作义部经7昼夜顽强抗战，将日伪军击退，并乘势反击，收复战略要地白灵庙、大庙等地。白灵庙之役的胜利，对于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是一个巨大鼓舞。

尽管国民政府对日政策随时局发展而出现积极变化，但重心仍放在“安内”，以“剿共”为要务，因而不能不遭受来自各方面的反对。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揭露国民党政策的反动性，不断呼吁全民团结抗战。国民党各派系，特别是左派爱国力量也通过各种形式，敦促国民政府改弦更张。早在1933年，曾在上海抗战中立下卓著功勋的第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树起抗日反蒋旗帜。1935年11月汪精卫被罢免随又被爱国人士刺伤。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的消息传出后，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界奋起，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北京学生游行示威一直持续到12月16日，还组织了南下宣传团，到南京宣传请愿，推动了全国各阶层抗战热情高涨。1936年6月，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实力派李宗仁决定以抗日名义反蒋，逼南京政府在抗日问题上表态。两广事变是西安事变的前兆。

蒋介石置民族危机于不顾，争取以“最后五分钟”彻底消灭红军。为了更集中力量剿共，1936年11月23日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君子”，对中间力量使用铁腕手段，使全国舆论大哗。同时，蒋调集中央军精锐部队约30万大军配置河南、陕西等地，扩充兰州、西安机场，准备发动对红军的第六次围剿。对于参加陕北剿共作战，张学良曾是十分主动积极的，但对红军作战失利，张学良转而和红军休战妥协。蒋无视业已达成协议的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现实状况，在匆匆解决了

“两广事变”之后，亲自飞西安坐阵，蛮横逼迫东北军、西北军打头阵，终于逼出了一个“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杨联合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事变发生后，国内外反响极为强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各派政治力量均通电呼吁政治解决，张学良受到强大压力，中共派出周恩来等人调停，蒋介石得到释放。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两党达成合作，国民党停止剿共，停止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中国内战基本结束。

中国抗日民族阵线的初步确立，打破了日军扶植傀儡不战而屈人的谋略计划，也为中国进行全面抗战完成了组织准备。当日军通过“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时，中国能够举国抗击，中日全面战争终于爆发。

4. 法西斯体制确立与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

战争对日本国内的影响

日本自“九一八”发动对华战争后，不但掳掠到巨大财富，还刺激了国内生产发展。自明治以来就畸形膨胀的军火工业，更加速运转，带动日本率先摆脱了世界大危机，于1933年前后转入复苏。工矿业生产指数、贸易发展指数等多项经济指标均居世界前列。棉纺织业输出，甚至超过了纺织大国英国而“位居世界之首”。^①

战争还对日本很严重的农村危机发生着重要影响。1932年7月斋藤内阁发起了在农村的“自力更生”运动，农林省成立了“经济更生部”，指导向占领地满洲地区大规模移民。法西斯皇道派头目荒木贞夫1933年提出《皇国国策基本纲要》，中心内容是强调扩充国防、救济农村两大政策。所以由于战争需要，军部与

① (日)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史》，旺文社，1980年版，第107页。

政党都提出了“救济农村”口号。到1935年前后，农村经济虽有所恢复，但同时由于军费增加，农村青年大量从军，致使劳动力日益匮乏。士兵大多来源于农村，故农村危机还直接影响着日本军队内部动态。许多中下级军官倾向于皇道派，支持法西斯运动。而皇道派的纲领和主张则是这一形势的要求和反映。由于战争的需要，军部要求独裁与专制，实行高压清洗政策，反战和平势力被日渐削弱。1931年12月犬养内阁上台不到半年，军部法西斯分子便于翌年5月15日发动暴乱，砍杀了向来倡导“产业立国”的政友会首相犬养毅。对于该次政变，军部在组阁等政治问题上给予了直接配合。陆相发布“陆军是反对政党内阁出现的”意见。^①“五一五”事件使在20年代为鼎盛期的“政党政治”走向衰败，失去了单独组阁的权力和地位。

在以政党为代表的议会民主派走向下坡路的同时，财界也更明确地离开政党，倒向军部，支持战争，形成“财阀转向”与“军财抱合”状况。^②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阀集团向满洲地区银行及各军火企业提供高达2000多万元的贷款。连一直被认为是比较稳重的关西财界也主张“以军事力量确保东洋市场”。1936年2月中旬总选举之后，三井便不再向政党提供经费。

对外战争与专权擅政的需要，使法西斯主义飞速发展起来。石原莞尔说：“满洲事变实质上是昭和维新之前驱。”^③军部法西斯主义势力的发展，不但表现在中下级法西斯军人频繁地发动政治暴动，还表现在各级政权机构的变化与理论纲领的形成。法西斯“一夕会”等组织成员已经分布军部各主要首脑机关，形成“幕僚派”，握有很大实权。1934年以陆军省新闻班名义，发布《国防之

①（日）秦郁彦：《法西斯主义运动史》，第56页。

②（日）大石嘉一郎等：《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的基础知识》，有斐阁，昭和50年，第418页。

③（日）角田顺编：《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91页。

本义及其提倡》。该小册子围绕对外战争问题，系统地阐述了军部法西斯的战争观、政治观，提出了一整套对日本实行法西斯改革的方针和措施。其主要内容有：1. 在体制方面要为将来的战争而整顿出优于对手的组织系统；2. 安定国民生活，使农村山地渔村获得新生，由此而稳定军队；3. 建立平时、战时通用的思想战体系，加强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培养“国家观念”，“要芟除极端的国际主义、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4. 积极发展先进武器特别是航空武器；5. 改变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实行“统制经济”，抑制自由竞争，确立战争经济体制。上述纲领核心为两个要点，即“战争”与“统制”。这一纲领出笼，说明军部已完全突破了明治宪政所规定的“军人不干政”等差别主义的束缚，由一个兵权机关彻底转变为政治军事机关，并成为日本国家体制全面法西斯化的统率中心。^①1935年2月军部又发起了“国体明征”等法西斯政治运动，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发动总攻，力图建立在天皇绝对权威统治下的法西斯专制秩序。

在法西斯阵营内部，因战争的需要而发生的派系斗争更加严重起来。在30年代初，即围绕着对外战争与对内政治的关系等问题曾产生分歧，形成了通常所称的皇道派与统制派。他们的分歧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对国家进行法西斯改造的手段问题，是自上而下合法改造还是自下而上发动政变，统制派主张前者而皇道派主张后者。其二是国内改造与对外战争关系问题，皇道派军人认为国内改造是首要的，而统制派大多主张“满洲第一主义，国内革新第二主义。”^②即以对外战争促成国内法西斯改造。两派矛盾愈演愈烈，陆军当局曾以搞军事政变为罪名逮捕了皇道派少壮

① 参见拙文《日本的军部政治化与法西斯主义的确立》，1988年第4期《历史研究》。

② （日）安部博纯：《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概说》，未来社，1975年，第209页。

军官多人,而后者则散发《关于肃军的意见书》,攻击控制了军部实权的统制派“党同伐异、朋党比周”^①。1935年8月,皇道派方面的精神领袖真崎甚三郎大将被免去陆军三大要职之一的教育总监职,改任军事参议官,激起皇道派少壮军人的愤怒,由相泽三郎将统治派头目之一的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砍杀在办公室。两派的剧烈冲突,说明日本的国内矛盾已经发展到一个十分紧急的临界点。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确立及其双重好战特性

考察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确立问题,对于深刻理解日本不断发动对外战争的原因有着极大帮助。从近代军国主义体制转变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是日本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20年代以来的法西斯运动的产物。其转折点是1936

年2月26日的“二二六”事件。事件的导火索是,陆军省宣布将第一师团调驻中国东北。第一师团是皇道派青年将校的巢窟,他们认为军部幕僚派蓄意调走第一师团,是为确立统制派在京畿的霸权,决定乘机起事。参加暴动的约1400名少壮派军人,散发《蹶起宣言书》,袭击首相、陆相官邸和陆军省、警视厅等官衙,杀死了内大臣、藏相等政府大员,冈田启介首相幸免于难(当时报载有误)。但统制派利用手中权力,迅速平息了叛乱,随又通过“肃军”清除异己,枪杀了10余名为首军官,4名大将被迫退出现役。到8月



图14 以“二二六”事变为契机日本确立了国内法西斯体制

^① (日)《现代史资料》4,第609页。

又对 3000 多名军官进行大调动。皇道派少壮军人遭受失败，但其建立法西斯军部独裁的目标却由统制派之手而加以完成。事变后的第二个月，军部扶植广田内阁出台，国家权力完全落入军部手中。

首先，军部指使内阁以极简单手续，恢复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该专任制度曾在 1913 年大正民主运动中被修改，放宽到后、预备役，虽然后来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过非现役大臣，但这种修改本身就是民主运动的一个成果。而广田内阁对旧法制的恢复，是对议会民主政治的公开否定，更加有利于军部严格控制政权。其次，广田内阁根据军部确定的四条施政大纲“明确国体、充实国防、刷新外交、安定民生”，制定出“充实国防”等 7 项国策，又遵循军部旨意更换了阁员吉田茂等人，改组合并内阁主要机构，新设置管理海外殖民地机构，加强对交通、通讯等部门的控制。其三，进一步强化对外战争政策，又一次修改了《国防方针》和《用兵纲领》，制订《国策基础》，为更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作了周密准备。其四，外交上先后同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达成反共协定，初步形成了国际法西斯主义联盟。

“日本近代政治史的发展就是军人干预政治的历史”。^①但自广田内阁开始的这种内阁政府全面受控于军部的状况尚未曾见过。因此，广田内阁的出台，标志着日本以军部为主导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正式形成。由于日本法西斯主义确立程序同意大利、德国不同，不是先取得政权再去推行对外战争，而是在战争的过程之中借助战争的推动实行法西斯主义，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强调其军国主义色彩的同时很容易忽略法西斯主义的性质，甚至将其法西斯主义体制误认为战时体制。这就会妨碍人们对日本国情的全面认识，查找不出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日本的相互关系和

①（日）福地重孝：《军国日本之形成》，春秋社，1959 年，第 64 页。

各自独特的作用。

的确，在专制集权和对外战争方面，“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是一对孪生子”。^①但区别在于，军国主义可以依附于各种政治形态，可以不改变国家政体，如民主制的雅典与寡头贵族制的斯巴达，都推行过相同的军国主义霸权政策。而法西斯主义则是一现代范畴，它必须要在现代工业化条件下，实行统治阶级公开、恐怖的独裁专制，法西斯主义是对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政治的否定，是民主政治的直接对立面。在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进程中，军部所关注的并不只是战争，它在政治形态上的目标同样十分明确。东条英机曾供认：“日本独特的制度——统帅权的独立使军部的发言权在政治领域膨胀。”^②石原莞尔也承认：“由于自由主义政党的没落，使军队担负起了政治上的重任。”^③日本军部作为兵权机关，打破了明治宪政体制所规定的军人不干政等差别主义的束缚，全面介入政治并逐渐取得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人格”，最终打破了在政权中与政党共存的“二重政府”局面，在军部的旗帜下实现了新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统一。因此，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就是军部的法西斯主义，是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与法西斯主义的结合——法西斯军国主义。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这一基本性质与特征，决定了日军的双重好战性质。为什么日本会首先在东方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在战争中甚至在僵局中不断扩大战争，为什么当其德意法西斯战争伙伴业已失败，日本仍坚持战争到最后才投降，其基本原因盖出于此。

对外战争政策的强化

① (日) 安部博纯：《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概说》，未来社，1975年版，第106页。

② (日) 《东条英机寻问录》，东京新闻社，第146页。

③ (日) 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455页。

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确立之后，从国家战略、经济发展、军事部署等等方面加强了对外战争政策。1936年初，酝酿对《国防方针》与《用兵纲领》进行第三次修改。“二二六”事件之后加快了修改速度，经过陆海军双方协调，终于在6月3日通过并得到天皇批准。这次修改对后来发动更大规模战争有着极重要的指导作用。其改动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条总纲方面，改订为“帝国国防之本义基于建国以来之皇谟，常以大义为本，加倍彰显国威”。^①这与1923年第二次改定的“帝国国防之本义在于保障帝国的自主独立”^②等内容相比，显然更富于进攻性、侵略性。

第二条规定要“整備武备”，以武力为对外政策之根本，以便于“在一旦有事之际，便可先机制敌，迅速达成战争目的”。此点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对外政策中的以武力为首要原则的战争政策，同时在军事战略方面仍是继1923年改订之后又一次确认“攻势原则”。

第二条中还决定“鉴于本国国情，必须努力强化绪战威力，此至为重要”。这里所说的国情，指其作为岛国及资源小国的特点，倘若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必然力量不支。故此点决定了日本在军事战略上重视绪战和速决战，强调“初战必胜”的原则。

关于长期战争即持久战争问题，第二次改订曾从国民的战时生活与物资补充着眼，强调“一有缓急，应以攻势作战将敌击破于领土之外，迅速了结战争局势。与此同时要确保海外物资输入并维护国民生活安全。要有承受长期战争的认识”。在作战上立足点仍在于速决战。而新的改订强调：“未来的战争大有长期继续之虞，必须作好承受这一状况的认识与准备。”立足点明确转向为长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95页。

② （日）《战史丛书·陆军军战备》，第93页。

期持久作战。从战略角度强调和重视长期战争与持久战争，这在日军战略思想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长期持久战思想的提出，同侵华战争有着显而易见的关系。

第三条规定了关于战争对手的序位问题。强调了美国和苏联从国力上看，是对日具有威胁的首要战争对手，又强调要同时作好对中国、英国进行战争的准备。无论是对美、对苏作战，都必须以中国国土作为作战基地，在其侵华战争正在进行之际，日本作出这样的决定，再度说明中国实际上是日本首要的战争对手，控制中国是日本对外战争的基本前提。

第四条规定了国家武装力量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要使陆海军势力达到当时世界第一流水平。

完成对《国防方针》和《用兵纲领》的修改之后，军部又操纵内阁于8月7日通过“五相会议”制定了《国策基准》和《帝国外交方针》，再度确认了对外的进攻性战争原则。《基准》中规定：“根本国策在于国防与外交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①实欲吞并整个东半球。该《基准》还对战争的方式与步骤作了周密的设计：“……以渐进的和平手段争取我之势力扩大，要完成满洲国的建设以期待国力的充实与强化。”它充分反映出“以战养战”和“总体战”的战略特色。

日本还为战争的需要制定了十分详尽的经济发展战略。1936年7月陆军参谋本部提出《为战备迫切期待开发产业》和《战备计划方针》等计划，同年底参谋本部又拟定《重要产业五年计划》，在上述方案基础上，陆军省在1937年5月向政府提出了《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纲要》。它决定在本土和新占领的满洲等殖民地上，为准备进行更大规模战争而全力发展各项产业，并要求对尚未完全控制到手的华北地区进行“开发”。其中重要生产项目的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90页。

指标有飞机 1 万架，力争在东北生产其总产量的 30%；汽车 10 万辆，在东北生产其 10%；钢材 1000 万吨，东北占 30%，等等。具体落实以战养战和进行总体战的经济指标。

日本确立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强化了对外战争政策，故其侵华战争的大规模升级，以及发动太平洋战争，便有如板上走丸，势在必行。

昭和新军制计划

为达到上述国策与战略目的，日本加紧扩军备战，提出了昭和新军制计划。按修改后的《国防方针》规定：日本武装力量应扩充到陆军 50 个师团，空军 142 个中队，海军主力舰 12 艘、航母 12 艘、巡洋舰 28 艘、驱逐舰 96 艘、潜艇 70 艘，海军航空兵 65 队，等等，^①力图成为世界首要军事强国。日军的军费开支急剧增加，1931 年直接军费为 4.55 亿日元，占国家总支出 30.9%；1936 年增至 10.78 亿日元，占总支出 47.2%。^②

为达成上述扩军计划，日军统帅部设计推行自明治建军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制改动，即实施昭和新军制计划。

其根本宗旨是扩充军队，加强部队的现代化装备，扩大特种兵部队的编制，充实发展航空兵力，整顿机关，努力缩减冗员，提高组织效率，发展军校教育，增加军校数量，增加教师、调整教学内容，以培训更多的军官，等等。

扩军中最关重要的是陆军的扩充，对于特种兵部队，将原编制中的炮兵、工兵、辎重兵独立大队和汽球队全部升编为联队。对于日军的基本战略单位师团编成，将原四单位制师团即 2 个旅团 4 个联队的编成调整为 3 个步兵联队，与扩编后的特种兵合编为 3 单位制师团，将抽出的联队合编成新的师团，以增加新的战略单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 395 页。

② （日）《日本历史》2，岩波书店，1981 年，第 63 页。

位（师团）。计划由平时的 17 个师团第一步增加为 27 个师团，并逐渐增至 50 个师团。对此方案陆军方面曾提出反对意见：日军的师团将在远东广阔复杂的地区内担负对欧美列强军团的作战任务，如果分割出一部分兵力而编成三单位制师团，战力势必减小，将导致正面决战威力减弱，难以发挥作战部署的运用之妙。^①尽管有上述反对意见，但迫于军备扩充的当务之急，该方案最终还是得以批准。

1936 年 11 月 26 日由陆军省正式颁布《军备充实计划大纲》，作出详细规定：“一、战时兵力，至昭和 17 年度（1942）之前整備大约 40 个师团及相应之各种部队，建飞行队约 140 中队及其相应之各种部队。二、平时兵力，到昭和 17 年度为止整備大约在满 10 个师团，日本本土及朝鲜 17 个师团及其相应之各种部队、飞行 140 中队及相应之各种部队，同时改进有关补充、动员、教育、补给、卫生等措施。三、关于整備作战器材，大致于昭和 12 年以至昭和 17 年度间在增加兵力、改善编制之同时，整備好大部分所需要的作战器材。”

根据上述宗旨，对地面部队的战时兵力编制规定办法有：一、改编战略单位。自昭和 14 年（1939）4 月始，从现制师团中减少步兵一个联队及野炮兵一个大队，使之改编为所谓三单位制师团；废止相关之旅团司令部，同时新设师团步兵司令部及师团炮兵司令部。二、新设联队与年计（年度动员计划）相比较，到昭和 17 年度为止新设置特种兵部队如下：独立速射炮队，汽车牵引十五榴炮联队，装备装甲作业车的独立工兵联队，台湾工兵队，防空气球队，装甲列车队，等。三、战时增加兵力部队，伴随师团数之增加，将增加军司令部数量及与此相关之野战部队中的军直属部队，及守备队伍、特种部队、留守部队。四、改善装备编制。1.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 402 页。

特设师团除一部外，大致和常设师团采取同一的编制装备；2. 提高各部队之通信、防空、防瓦斯毒气、防坦克及自卫装备；3. 步兵联队之内大队编为三中队、机关枪一中队、步兵炮一小队，另全面提高联队的重火器和轻机关枪等装备；4. 骑兵部队全面提高轻机关枪、重火器及装甲车等装备；5. 野炮兵联队内大队编制改为野炮兵二中队，十榴炮一中队；6. 废止野战重炮兵旅团司令部及同旅团辎重队；7. 整备补给机关之同时改善给养装备；8. 强化防卫部队特别是地面部队之编制，且提高其装备。……^①

在扩军同时，对于战区指挥系统权限等问题作了较大修改。1936年7月24日，改订了师团、军司令部条例，规定：“师团长（军司令官）为了地方（含朝鲜、台湾）之防卫，在紧急必要之时可以指挥统辖师管区内（或在朝鲜、台湾）之部队。”防卫司令部之权限也同时作了规定，^②从而使日本在海外驻军的部署和指挥得到调整。在中国战场扩大华北驻屯军，不但兵力得到扩充，整个驻屯军升级与关东军平起平坐，改变了驻屯军原为守备交通和使馆区的守备队性质，转而成为可以攻城掠地的又一个海外重兵集团或野战兵团。此举实为对华北开战所作的指挥机关调整与兵力部署。

上述计划是日本陆军方面为适应“必然发生之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作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之准备，被称为一号军备。这一计划在后来的实行中有较大修改，新设部队大多实行三单位制，而原四单位制师团改三单位制师团一举，拖延到1943年前后才大部实行，并继续保留了部分四单位制师团作为骨干。

日军在上述军备扩充计划（一号军备）实施后即将侵华战争全面升级，战争爆发后又追求新的扩充，1939年12月以上述计划

①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403～404页。

② （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145～146页。

(一号军备)为基础制订《修正军备充实计划》(二号军备),1940年7月修订形成《更改军备充实计划》(三号军备),1942年春修改、形成《基本军备充实计划》(四号军备),并进行太平洋战争。日本军备自侵华战争开始前所未有地飞速膨胀,其对外战争则愈演愈烈,愈战愈大。这连续四个扩军计划所促成的日本扩军速度,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十分少见的。